

作为舆论构造：传闻与《红楼梦》的“流言蜚语”式阅读

温庆新

(扬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2)

摘要：历代读者针对《红楼梦》作者、创作、本事、传播等方面的内容，构造了形形色色的传闻。此类传闻采用先引用后评价的叙事套路，有意无意地聚拢《红楼梦》的各种信息，形成了理智与非理智相交织的“流言蜚语”式社会舆论。这是传闻者阅读《红楼梦》时情趣、态度及惯习的体现，扩展了《红楼梦》在传闻者各种回忆叙事中的认知视角，展现了传闻者阅读想象的多样可能。从阅读史研究的角度看，作为一种阅读构造的传闻，增加了彼时各式人群谈论的可能性。《红楼梦》传闻的构造与传播不仅能够还原此书被观察和阅读的典型细节，亦可抽绎出《红楼梦》在世俗社会中的形象和价值。此举对于重新审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流传过程中广泛存在的传闻构造现象，有着重要的方法启示。

关键词：《红楼梦》；传闻；舆论构造；阅读史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5)05-0205-10

《红楼梦》在流布过程中，出现了众多“流言蜚语”式的传闻。这些传闻主要针对《红楼梦》作者、版本、故事及传播等方面，甚至存在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之风。它成为《红楼梦》流布的重要舆论。《红楼梦》传闻者在述及他人的同类传闻时，往往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评价或阅读感受。这促使传闻者的言说话题不知不觉地与周遭的其他谈论联系起来，构成了《红楼梦》各类话题在众多传闻环境中的舆论生态。此类舆论是一种束缚《红楼梦》各种阅读活动的控制机制，带来了传闻意见的无序表达。相关表达导致《红楼梦》的阅读意义存在着一种舆论的波动，进而影响《红楼梦》流布的社会进程。学界提及此类传闻时，往往予以批评鄙薄。然而，从阅读史研究的角度看，通过《红楼梦》传闻的社会舆论构造能够探讨此书进入读者视线的蛛丝马迹。历代读者对《红楼梦》传闻的另类阅读，有助于探讨社会舆论的持续性更迭如何影响此书阅读意义生产的过程。

一、传闻与《红楼梦》“污名化”舆论的社会影响

所谓《红楼梦》的社会舆论，强调历代读者对《红楼梦》作者、创作、传播、内容、意义及阅读等方面予以关注时，其所普遍存在的共同意见或相类看法。此类情况折射出《红楼梦》阅读者对其所关心的事件、现象、问题的一种强烈性或持续性意见的多层次表达诉求。就《红楼梦》流播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传闻及其被多次传录的现象而言，各种传闻之说可谓构成了《红楼梦》被社会识别的一种典型舆论。尤其是，传闻者会强化自身关于《红楼梦》种种“流言蜚语”的态度、意见及情绪，在诉之成文的字里行间混杂着种种理智与非理智相交的感触、说教及相关认识。这种情况在京城和江南地

收稿日期：2025-02-04；修回日期：2025-04-15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现代‘小说话’与中国古代小说经典建构研究”(24ZWB010)；江苏省第六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

作者简介：温庆新，男，福建泉州人，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小说史及小说文献，联系邮箱：wen_qing_xin@163.com

区的传闻衍变中,更为突出。

例如,曾高中江南解元的江苏山阳人潘德舆(1785—1839)在《金壶浪墨》“读《红楼梦》题后二”条中,针对作者“传闻”曾说道:

或曰:“作是书者有所指斥欤?”余曰:“否!其人自言情耳。专意指斥者,其文不能代为叙述而惨怛若此。”或曰:“传闻作是书者少习华靡,老而落魄,无衣食,寄食亲友家。每晚挑灯作此书,苦无纸,以日历背写书,未卒业而弃之。未十数卷,他人续之耳。”余曰:“苟如是,是良可悲也。吾故曰其人有奇苦至郁者也,偶抒其事,故作之不必成。续之者非佳手,富贵世俗人耳,并儿女之情,彼并不知其沉且笃者也。若续之后又有续,且屡续不一,其书吾皆见之,殆至愚极薄之人所为。彼其人读《红楼梦》无所用其泣,而况能疑且叹乎?如是而续,直不值一大噓,而况取《红楼梦》者演为传奇,授之梨园乎哉?不为鸡口而为牛后,此辈接踵于天下久矣。”吾每曰:“无情者不可妄读书,亦不可妄作书。”郭芋田曰:“愿日持此语以告天下妄读书,且妄作书者。”^{[1](1109-1110)}

此处所载“作是书者少习华靡,老而落魄,无衣食,寄食亲友家”的作者境况、“每晚挑灯作此书”的创作细节及“未十数卷,他人续之耳”的版本衍变,这些皆是潘德舆的一家之见。这并非基于可靠来源而说的,而是潘德舆作为舆论传闻者之主观情绪的外化表达。因为潘德舆在“读《红楼梦》题后一”条中曾指出:“余始读《红楼梦》而泣,继而疑,终而叹。……吾谓作是书者,殆实有奇苦极郁在于文字之外者,而假是书以明之。故吾读其书之所以言情者,必泪涔涔下,而心怦怦三日不定也。”^{[1](1108-1109)}据此可知,潘德舆在“读《红楼梦》而泣,继而疑,终而叹”的情感主导下,有意针对彼时社会所流传的各种舆论予以辩驳。这引发了潘德舆参与《红楼梦》传闻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潘德舆与淮安诸生郭芋田(1773—1823)的日常交流,又带来了为《红楼梦》进行“有奇苦极郁在于文字之外者,而假是书以明之”的主题正名。此举可看作是潘德舆对《红楼梦》传闻的一种舆论引导。

进一步讲,《红楼梦》的社会传闻往往都是一种公开化的言语意见,代表着传闻者针对《红楼梦》存在与流播的特殊态度。传闻者记载《红楼梦》“流言蜚语”之前或之时,其脑中就已存在针对《红楼梦》种种传闻的评判标准或言说侧重点。当他们有关《红楼梦》传闻的先入之见受到外在信息的刺激时,时常表现出不以理性分析为主导的接受反应。他们反倒是热衷于各自的想象,借此重构自身关于《红楼梦》作者、创作、流传及意义的某种自认为是特别熟悉或重要的具体细节。此类“读者本位意识”^[2]促使传闻者通过传闻的方式,去表达自身关于《红楼梦》“流言蜚语”的谈论兴趣及其各类阅读感受。

一个典型的例子,如吴江人陈镛《樗散轩丛谈》(嘉庆九年所刊)卷二“红楼梦”条所言:“晤江宁桂愚泉,力劝勿看《红楼梦》。余询其故。因述常州臧镛堂言,邑有士人贪看《红楼梦》,每到入情处,必掩卷瞑想,或发声长叹,或挥泪悲啼,寝食并废,匝月间连看七遍,遂致神思恍惚,心血耗尽而死。又言,某姓一女子亦看《红楼梦》,呕血而死。余曰:此可云隔靴搔痒,替人耽忧者也。然《红楼梦》实才子书也。初不知作者谁何,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巨家间有之,然皆抄录,无刊本,曩时见者绝少。乾隆五十四年春,苏大司寇家因是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钉,坊中人借以抄出,刊版刷印渔利,今天下俱知有《红楼梦》矣。《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第原书仅止八十回,余所目击。后四十回乃刊刻时好事者补续,远逊本来,一无足观。近闻更有《续红楼梦》,虽未寓目,亦想当然矣。”^{[3](31-32)}这条文献被刊于同治十三年(1874)的倪鸿《桐阴清话》、光绪七年(1881)所刊的邹弢《三借庐笔谈》多次引用。据周绍良所考,该文献或是陈镛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左右在北京时的见闻记录。其写作目的系陈镛“迷信前八十回,亦一复古派,对一百二十回刊本嫉之如仇,几同裕瑞之见,故道听途说,甚或徒凭臆测,遂有此恶评耳。另外一种可能,则苏家所藏实系一百二十回抄本,而陈镛以之与活字本出版事混为一谈,因他见过八十回抄本,不满刊本后四十回,嫁祸于程”^[4]。不论是陈镛的“道听途说,甚或徒凭臆测”,还是“嫁祸于程”,这些批评之意发端于外在信

息的刺激，能够唤醒传闻者对此前见闻的回忆之举。由此带来的“因述常州臧镛堂言”等内容，则在主观上增加了《红楼梦》传播的一种侧面。其中所形成的“隔靴搔痒，替人耽忧者”与“亦想当然”的评价态度，饱含着陈镛对此类传闻的不满。尤其是，从潘德舆与郭苧田的谈论，到陈镛与桂愚泉的交流，折射出相关传闻往往是一种在友朋知交之间散布的舆论。基于《红楼梦》传闻的日常交流，这既是传闻者个人情绪与意见的宣泄凭借，又是《红楼梦》舆论导向的重要生成环境。

其间与传闻相关的人或事，代表彼时不同层次的人群对《红楼梦》流播的各异态度。如臧镛堂的言论隐含着批评《红楼梦》不良教化之意，致使桂愚泉对《红楼梦》的进一步鄙薄。这导致了陈镛对《红楼梦》作者与刊本传闻的批评，加重了《红楼梦》消极舆论的渲染。此类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与八十回本之孰先孰后的社会争论。光绪二十二年(1896)所刊的甫塘逸士《续阅微草堂笔记》就指出《红楼梦》“自百回以后，脱枝失节，终非一人手笔。戴君诚甫，曾见一旧时真本，八十回之后，皆不与今同。荣、宁籍没后，均极萧条；宝钗亦早卒；宝玉无以作家，至沦于击柝之流；史湘云则为乞丐，后乃与宝玉成夫妇，故书中回目，有‘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之言也。闻吴润生中丞家，尚藏有其本，惜在京邸时未曾谈及，俟再踏软红，定当假而阅之，以扩所未见也”^{[3](837)}。此处所言“曾见一旧时真本，八十回之后，皆不与今同”，大致代表《红楼梦》版本传闻过程中一种常见的评价策略。此处的话语表达往往使用“曾见”“曾谈及”“以扩所未见”等不确定性词汇。此举表露出传闻者的各种探究欲望。这致使《红楼梦》传闻舆论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最终导致传闻者的各类说法会受到新的信息刺激而被迫转移谈论的重心。上引甫塘逸士的载录就受到戴诚甫、吴润生等人的双重刺激，形成了对“旧时真本”的探究兴趣。这表明《红楼梦》各种传闻舆论之间是相互交叉乃至矛盾的。这样一种交互影响，导致不同传闻主体热衷于针对彼时流行的各种传闻加以比较，进而产生一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舆论效应。如甫塘逸士的话就曾被刊于《上海晶报》的《臞蛩笔记·红楼佚话》所引用：“某笔记言，有人曾见旧时真本，后数十回文字，皆与今本绝异。”^[5]此类引用使得《红楼梦》各类传闻在被重提的流播过程中，引起了更大范围的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晚清以降的《红楼梦》传闻渐趋多样化，处于一种众说纷纭的境地。这些传闻在社会教化的制约下，紧紧围绕《红楼梦》的社会影响予以言说。其间既有相类的情况，亦有差异性。传闻者往往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阅读体验去估量各种传闻的价值，形成了肯定或否定的感知态势和舆论疏导。例如，清朝名臣梁章钜之子梁恭辰(1814—1887)在《北东园笔录四编》卷四“红楼梦”条中，言：

《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乾隆五十年以后，其书始出。相传为演说故相明珠家事：以宝玉隐明珠之名，以甄(真)宝玉贾(假)宝玉乱其绪，……满洲玉研农先生(麟)，家大人座主也，尝语家大人曰：“《红楼梦》一书，我满洲无识者流，每以为奇宝，往往向人夸耀，以为助我铺张。甚至串成戏出，演作弹词，观者为之感叹欷歔，声泪俱下，谓此曾经我所在场目击者。其实毫无影响，聊以自欺欺人，不值我在旁齿冷也。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书为诬蔑我满人，可耻可恨。若果尤而效之，岂但《书》所云‘骄奢淫佚，将由恶终’者哉？我做安徽学政时，曾经出示严禁，而力量不能及远，徒唤奈何！有一庠士颇擅才笔，私撰《红楼梦节要》一书，已付书坊剖剞。经我访出，曾褫其衿，焚其板，一时观听，颇为肃然，惜他处无有仿而行之者。那绎堂先生亦极言：‘《红楼梦》一书为邪说讹行之尤，无非糟蹋旗人，实堪痛恨……’则与我有同心矣。此书全部中无一人是真的，惟属笔之曹雪芹实有其人，然以老贡生稿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后萧条，更无人稍为抚恤，则未必非编造淫书之显报矣。”^{[3](32-33)}

此处关于“相传为演说故相明珠家事”的细节描述和玉研农查禁努力的载录，首先存在于梁恭辰“与我有同心”的相似感受中。此类相似评判促使《红楼梦》传闻的舆论意义被逐渐重视起来。这突显了彼时士人群体对《红楼梦》传播影响的焦虑心态。传闻者基于“邪说讹行之尤”等角度去引导《红

红楼梦》的教化意义,希冀形成曹雪芹“编造淫书之显报”的社会影响。凡此种种,促使相关传闻存有向世人加以道德宣导的说教色彩。从这个角度讲,《红楼梦》传闻不仅产生于熟人知交之间,亦在一定范围内引发了士人群体的广泛议论。它促成了历代士人群体谈论或予以价值评判的共同导向,逐渐演化为《红楼梦》流播过程中一种极具批判色彩和价值暗示的社会舆论。

要言之,传闻拓展了《红楼梦》流播时的话题谈论范围。这促使不同时期所产生的各类传闻在新的载录中,获得一种超越时序的重提可能与对话空间。此对话可能不仅促使《红楼梦》在传闻者重提的个人意见与过去的传闻之间形成实质性的相互影响,而且推动《红楼梦》从读者的个体写作一步步走向社会,促成《红楼梦》阅读舆论的持续演进。在传闻的舆论导向中,《红楼梦》得到传闻者各种情绪强烈的重构,进而形成予以价值鄙薄或地位贬低的“污名化”^[6]社会舆论,奠定了《红楼梦》被个体化知识生产的基础。此类传闻的文献价值尽管是不足一提的,但也带有传闻者诸多偏见的存留痕迹。传闻作为一种思想行动与阅读探索,清晰反映出作为阅读主体的传闻者接触《红楼梦》时的阅读兴趣点与表达侧重点,并构成了《红楼梦》阅读活动的一种重要场景。此类阅读场景展现了《红楼梦》由个体阅读到社会生产的演进历史。袁枚在《批本随园诗话》卷二“曹氏父子”条中曾指出:“乾隆五十五六年间,见有钞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指忠勇公家为近是。”^[7]此处的“或云”传闻尽管缺乏实证,却让袁枚在“指明珠家”“指傅恒家”的舆论构造中,获取“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之类的别样阅读联想。这些联想是传闻者阅读《红楼梦》时,其情趣、态度及惯习的变动体现。传闻者在“污名化”社会舆论和吸纳其他传闻的过程中,逐渐扩大《红楼梦》的传播范围,有效地推动了《红楼梦》的多样化阅读。

二、“流言蜚语”与《红楼梦》以讹传讹式阅读构造

传闻提供了《红楼梦》流布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使后世读者对传闻的舆论接收提出了各自的解读意见。此类解读行动的极端化情况,是导致后世读者热衷于《红楼梦》传闻的以讹传讹式构造,出现了“流言蜚语”式阅读想象。此类情况时常波及世人对《红楼梦》阅读意义的自由探索。

一是,传闻者采用先引用后评价(定性)的叙事套路,有意无意地聚拢《红楼梦》的各种流布信息。这就促使《红楼梦》的后世阅读,存在着参照各种传闻之后的猎奇言说倾向。光绪六年(1880)进士及第的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言:“此书相传所称贾宝玉即纳兰成德容若,按之事迹,皆不相合,要为满洲贵介中人。其中矛盾煞戾甚多,此道中未为高作。自言改定者为曹雪芹。袁子才《诗话》称雪芹为江宁织造之子,或又谓容若自撰。以予观之,盖即所谓贾宝玉者创草此稿,故于私情密语,描写独真。曹雪芹殆其家包衣,因为铺叙他事,加以丑语,嗣又有浅人改之,不知经几人手,故前后讹舛,笔墨亦非一色也。(泾县朱兰坡先生藏有《红楼梦》原本,乃以三百金得之都门者,六十回以后与刊本迥异。壬戌岁余姚朱肯夫编修于厂肆购得六十回钞本,尚名《石头记》。雪芹为曹练亭子。练亭名寅,曾官江宁织造两淮盐政。著有练亭诗钞,又尝校刊字学五种,扬州诗局十二种。)”^[8]此处的“相传”云云,是为引出李慈铭阅读《红楼梦》之后的“以予观之”,其目的是寻求“于私情密语,描写独真”之类的感观表达。在这个意见生成中,李慈铭所得出的“知经几人手,故前后讹舛,笔墨亦非一色”等结论与“相传”的其他诸说有别,由此连带记录朱兰坡、朱肯夫收藏《红楼梦》的版本资讯。此举除了说明《红楼梦》版本复杂多样之外,更是李慈铭为自身的“前后讹舛”等观点作注解。此条文献对《红楼梦》作者与版本的传闻信息汇集,是建立在李慈铭阅读文本之后心生好奇而探索以致的。从这个角度讲,传闻拓展了李慈铭的《红楼梦》阅读体验,也增加了《红楼梦》各类新奇信息的汇集可能。可见,传闻者基于好奇的意念发端与评论传闻的言说逻辑展开的行动,能够带来《红楼

梦》各类传闻的新阅读。《红楼梦》在世人的传闻猎奇中，不断扩大文本信息被讨论的范围，也增加其流播及信息发散的频率。

二是，《红楼梦》传闻舆论的分散化，使得作为一种话语形态的传闻能够充分展现传闻者的情感触动，进而在传闻者的各种索隐中促成新的传闻。这种情况时常是传闻者针对自身阅读《红楼梦》时的某种心态而生发的。它是传闻者品评《红楼梦》时予以情感宣泄而形成的一种新思索。由此出现了透过传闻构造以形成《红楼梦》、传闻者的对象化阅读及相关社会舆论三者的联结，进而催生三者联结之后共同创造《红楼梦》新文本意义的舆论再造。比如，会稽人赵之谦(1829—1884)在《章安杂说》第41条中说道：“世所传《红楼梦》，小说家第一品也。余昔闻涑甫师言，本尚有四十回，至贾宝玉作看街兵、史湘云再醮与宝玉方完卷。想为人删去，然以删去为得。余意若能于通灵失去后再删数处，更有尽而不尽之妙。此书妙处只在‘不尽’二字。如作书者无垂不缩、无往不收，其笔力大处如叙庆吊诸篇，信乎掇拾，拉拉杂杂，无一处不乱，而无一处不到，可惜用之此等。”^{[9](17)}“昔闻涑甫师”所言的内容与赵之谦所阅读的版本内容不尽一致。因而，他尝试从阅读的“余意”去揣摩曹雪芹的原本构思与《红楼梦》“尽而不尽之妙”的文本魅力。这种透过传闻的意见生发，导致赵之谦始终抱着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式的探索趣味。因而，《章安杂说》第42条又说：“余于此书，窃谓其命意不过讥切豪贵纨绔，而尽纳天地间可骇可愕之事。须眉气象，出以脂粉精神，笑骂皆妙。其于黛玉才貌写到十二分，又写得此种傲骨，而偏痴死于贾宝玉。正是悲咽万分，作无可奈何之句，乃读者竟痴中生痴，赞叹不绝。试思如此佳人，独倾心一纨绔子弟，充其所至亦复毫无所取，若认真题品，则全部《红楼梦》，第一可杀者即林黛玉。余尝持以示读此书者，皆不为然。尝一质芟甫。芟甫仅言‘似之’。前夜梦中复与一人谈此书，争久不决。余忽大悟曰：‘人人皆贾宝玉，故人人爱林黛玉。’谈者俯首遁去，余亦醒。此乃确论也。”^{[9](17-18)}此处主要强调“余于此书”的独家“窃谓”意见，以显示与“人人皆贾宝玉，故人人爱林黛玉”的异趣。同时，赵之谦与芟甫的交流、虚拟和他人的“争久不决”，则强化了自身的独家感悟。他希冀以此达到对“深于文者知之”的说教。这样一种品评细节与感触表达，不仅体现他借传闻引出谈论话题的意图，而且隐含着其借助舆论效应去传播自身见解的阅读公开化。尤其是，“试思如此佳人，独倾心一纨绔子弟”云云，显然有一种借此言彼的意味；它仍会回归传闻者对《红楼梦》文本寓意或内容的各种索隐兴趣，以达成“试思”之类的阅读解惑诉求。

三是，传闻的舆论导向构造了《红楼梦》社会形象的多重不良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红楼梦》的阅读意义。在《红楼梦》的各类传闻中，资讯类传闻经过多重传导而逐渐演变成具有观念形态的社会舆论。此类社会舆论不仅赋予相关传闻一种社会存在意义，而且逐渐固化成价值先导的批评成见，影响《红楼梦》的正面阅读意义。例如，汪堃《寄蜗残赘》(1872年刊印)卷九“红楼梦为讖纬书”条指出：“《红楼梦》一书，始于乾隆年间，后遂遍传海内，几于家置一编。聪明秀颖之士，无不荡情佚志，意动心移，宣淫纵欲，流毒无穷。至妇女中，因此丧行隳节者，亦复不少。虽屡经查禁，迄今终未绝迹。相传其书出于汉军曹雪芹之手。嘉庆年间，逆犯曹纶，即其孙也。灭族之祸，实基于此。曾闻一旗下友人云：‘《红楼梦》为讖纬书。’相传有此说，言之凿凿，具有证引。是耶非耶？吾不得而知之矣。”^{[3](34)}在这条传闻中，“遍传海内，几于家置一编”即属于没有特别指向的资讯类传闻。其用意是说明《红楼梦》的流行程度，引出“宣淫纵欲，流毒无穷”的固化成见。这种倾向经过“相传其书出于汉军曹雪芹之手”的传闻解读，即刻隐含“灭族之祸”之类的道德谴责与价值否定，从而框定《红楼梦》不良舆论的存在意义。由此引出“曾闻一旗下友人云”的诸多传说与“《红楼梦》为讖纬书”的总体认识，这些情况进一步否定《红楼梦》的社会形象，同时又演化为一种“是耶非耶？吾不得而知之”的新流言。我们从汪堃模棱两可的叙事中，可以发现其深感于《红楼梦》流言的危害性。不过，“意动心移，宣淫纵欲”之类的非理智情况，也为后世读者的自由阅读提供了发挥的空间。这样一种教化意义的强调，导致《红楼梦》在传闻的话语构造中，不仅会增加传闻者的厌恶心理，从

而产生更多的负面性意见,而且会增加世俗阅读者的心理压力,带来关于《红楼梦》知识特征的某些负面表述。

四是,《红楼梦》传闻中的“曾闻”“世传”等语词在“刺激—反应”的舆论模式作用下,不仅传达着传闻信息的来源,亦揭示了传闻的传播途径,甚至产生相关传闻是否具备“言据性”的各种认识。这致使传闻易于流为一种“流言蜚语”式的有意传导,进而在影响《红楼梦》正面接受的情况下强化世俗阅读景象的不可遏制。比如,《申报》(上海版)1872年6月3日曾以《羊城新闻》为题,刊登了一则因评阅《红楼梦》而遭父杖责的新闻。在此则新闻中,当“酷嗜阅说部传奇等书”的陈元圃之子陈笏被其父“偶于书丛中得《红楼梦》一卷”时,“陈变色谓:不肖子仍嗜此耶?其子不敢作声,俄而风动卷开,陈睹卷首评语淋漓,皆其子手笔,乃怒不可制,谓读书人有此,名教扫地矣,杖之。其子谓此乃未奉庭训以前之事……夫说部传奇等作,多属墨沼烟云,而徒以才子佳人引人入胜,少年血气未定者阅之,鲜不为淫魔所祟。于是日向故纸中求佳丽,久之,且不必展卷,而佳丽亦俨然在心目中矣。淫书之为患若此,而《红楼梦》虚中有实,尤为此中魁首,世传为曹雪芹所撰。按,性德字容若,原名成德,满洲人,大学士明珠之子,《红楼梦》中所谓贾宝玉者,即其人也。《茶余客话》载,其年十七为诸生,十八举乡试,十九成进士,二十二授侍卫。《红楼梦》云乃其髫龄事,曾有诗云:‘幽谷有美人,无言若有思。含颦但斜睇,吁嗟怜者谁?予本多情人,寸心聊自持。私心托远梦,初日照帘帷。’意即为林黛玉而发耶?张船山太守云,八十四回以后,乃高兰墅续撰”^[10]。陈元圃因其子阅读《红楼梦》而杖责之事,原属于社会传闻,亦系世俗之人的谈资。《申报》不仅当作传闻予以登载,又借机刊载《红楼梦》的相关资讯;其以“世传”所引出的说明,径直将纳兰性德的作者传闻当作一种定论,甚至引用阮葵生《茶余客话》、张问陶《船山诗草》以形成定论。这样的传闻即是一种“流言蜚语”式的构造。它通过公开污名《红楼梦》读者的世俗形象,意图达到否定《红楼梦》阅读价值的目的。当然,此举也能够让世人看到《红楼梦》阅读之风的盛行。因为“淫书之为患若此,而《红楼梦》虚中有实,尤为此中魁首”,恰恰是《红楼梦》巨大社会影响的说明。这也指明了在《红楼梦》阅读舆论中,世俗之人的喜好程度。

五是,“流言蜚语”在后世读者的以讹传讹构造中,展现了传闻者阅读想象的多样可能。此举带来了传闻者“言之凿凿,似亦颇有佐证者,录之亦足以广异闻”^[11]之类的有意传播。一个典型例子如太仓姚鹏图(1872—1921)在《饮水诗词集跋》中所言:“《红楼梦》中之宝玉,相传为即纳兰成德。黛玉未嫁,何以称潇湘妃子?第□回云:宝玉梦入宫殿,见黛玉非人世服,惊呼林妹妹,侍者谓此王者妃,非林妹妹云云。黛玉不知何许人,盖与纳兰为表兄妹,曾订婚约,而选入宫。纳兰念之,曾因宫中啐经,纳兰伪为喇嘛僧,入宫相见,彼固不知其纳兰之易装而入也。书中所云盖谓此。此语伯希语道希,予盖得于道希之弟云。阿检记。”^[12]这里关于林黛玉为王妃及其与“纳兰为表兄妹,曾订婚约”的传闻,可谓是捕风捉影。从阅读的体验看,此类“流言蜚语”满足了传闻者相互谈论之后的文本探求欲,也扩大了传闻者的各种索隐热情。传闻之下关于《红楼梦》各式各样的谈论话题,拓展了作为阅读主体的传闻者之间的经验或情感交流空间。因此,唯我又言:“尝记往见《石头记》旧版不止百二十回,事迹较多于今本。其最著者,荣、宁结局如史湘云流为女佣,宝钗、黛玉沦落教坊等事。某笔记载其删削源委谓:某时高庙临幸满人某家,适某外出,检书籍,得《石头记》,挟其一两册而去。某归大惧,急就原本删改进呈,高庙乃付武英殿刊口印。书仅四百部,故世不多见。今本即当时武英殿删削本也。余初深疑,以为《石头记》一说部耳,纵有粗俗语,某又何至畏高庙如是至甚,必删改而后进呈?今读鹏图《饮水集》跋语,乃知原本所有如钗、黛沦落等事,实大有所犯忌,吾疑以释,而鹏图之语,得吾说亦益可信。作《石头记》者,用心深矣。”^[13]其所言“钗、黛沦落等事”与“某归大惧,急就原本删改进呈”等据传闻而展开的杜撰,展现了传闻者在传闻构造中参与《红楼梦》文本“创作”的细节。这是一种饱含传闻者个人情绪的主观化想象,亦是《红楼梦》阅读效应的体现。

当传闻的信息传播、谈论转引、细节杜撰及“随笔”而书的常态情状都能够让传闻者获得积极的情绪价值时，传闻舆论的社会影响力将会持续增强。这会强化传闻之下的读者“期待视阈”，能够有效推动《红楼梦》的多样化阐释。

总之，《红楼梦》传闻乃至各种“流言蜚语”的存在，拉近了不同时期各类读者与《红楼梦》之间的心理距离，也扩展了《红楼梦》在传闻者各种回忆叙事中被加以阅读的理解视角。这就形成《红楼梦》多维阅读意义的一种社会舆论。此类舆论生态深化了《红楼梦》阅读的世俗关注度。

三、传闻的阅读史价值及知识意义

据前所引的《红楼梦》各类传闻的缘起、细节及舆论导向，可知传闻者并不在乎其所传闻的内容对《红楼梦》流播的实际影响，而主要是基于自身的各种兴趣及其品评快感或批判诉求。从《红楼梦》传闻的生产过程看，彼时产生各式各样传闻的重要缘由在于传闻者对《红楼梦》的认识偏差。不论是“《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之类的舆论定性，还是“《红楼梦》一书，始于乾隆年间，后遂遍传海内，几于家置一编”之类的影响说明，抑或是“世所传《红楼梦》，小说家第一品也”之类的艺术肯定，乃至“《红楼梦》一书，我满洲无识者流，每以为奇宝，往往向人夸耀，以为助我铺张”之类的传闻生产描述，皆触及《红楼梦》传闻过程中世俗之人对该书的某种认知侧重。这些侧重点导致传闻者在先入为主的批评观念中，已然存在予以进一步否定、批判的舆论导向。传闻者各自所言的传闻内容，确实在言说话题、知识构造等方面推进了《红楼梦》的世俗新发现。这些传闻的反复炒作，在整体上强化了“晤江宁桂愚泉，力劝勿看《红楼梦》”之类的世俗偏见，也带来了“淫书之为患若此，而《红楼梦》虚中有实，尤为此中魁首”之类的批评共识。我们从舆论通过世俗欲望以达成世俗者的满足感、带动后续的可能对话以形成有真正社会影响的生产过程来看，传闻正塑造着《红楼梦》雅俗兼具的知识特性。这种特性使《红楼梦》传闻的流播，可能出现类似于谣言的极端情况。如有读者将林黛玉与读《牡丹亭》却郁郁而亡的明代才女冯小青之事相联系，从而发出“我每想一部《红楼梦》只是为林黛玉而作，正与《小青传》所谓‘红颜薄命’，同声一哭”^[14]等感慨。这大概属于读者阅读之后的一种臆断，并无相应的文献佐证，颇类于谣言。此类多样化的传播动态，已不再追求事实的合理价值；它是一种世俗谈资的必然举动，是读者阅读《红楼梦》之后的联想。不论是传闻还是谣言的构造，乃至二者交杂之后的混合传播，这些行动皆可以成为不同读者阅读《红楼梦》而生发各异感触的反馈。这由此产生了《红楼梦》的两种不同阅读细节：一是，加重了世人对《红楼梦》的“喜阅之情”；二是，传闻者针对此前的传闻而尝试提出新的合理解释。前者如“徒以才子佳人引人入胜，少年血气未定者阅之，鲜不为淫魔所祟。于是日向故纸中求佳丽”等内容，这是借机遮掩传闻对世俗读者实际阅读的干扰。后者如“今读鹏图《饮水集》跋语，乃知原本所有如钗、黛沦落等事，实大有所犯忌，吾疑以释，而鹏图之语，得吾说亦益可信”之流，其意图取信读者，传递新的解读意见。

从《红楼梦》阅读舆论的构造历程看，各类传闻批评促使《红楼梦》形成了突破彼时社会阶层固化限制的假象，增加了各式人等谈论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这些促使读者希冀对《红楼梦》加以知识层级拔高的各类举动获得了一定的舆论宣导。就舆论的社会影响而言，此类传闻塑造了《红楼梦》与乾隆皇帝、和珅、纳兰性德、慈禧太后等历代统治阶层或上层社会相关联的存在表象，揄扬了《红楼梦》跨阶层传播的流行舆论。例如，常州人赵烈文(1832—1893)的《能静居笔记》曾载：“谒宋于庭丈(翔凤)于葑溪精舍，于翁言：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坤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曹实楝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给。其父执某，钥空室中，三年遂成此书云。”^[15]这里径直将和珅进呈《红楼梦》给乾隆皇帝当作一种“事实”予以

转述。其所体现的载录细节,给人的感觉俨然煞有其事似的。又,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六“小说禁例”条云:“或谓是时宫禁中流传甚广,故不能绝。闻孝钦颇好读说部,略能背诵,尤熟于《红楼梦》,时引贾太君自比。”^[16]此处“或谓”所特有的细节传闻,不外乎加强《红楼梦》流播与彼时统治阶层或上层人士有关的心理暗示。然而,它们不会对传闻来源或依据的可靠性作详细的说明,而是基于证据的暧昧性去传播世人所感兴趣的诸多“传说”,从而在扑朔迷离的、神秘的叙事氛围中强化其所载内容的权威导向性。

据此看来,传闻促使《红楼梦》的读者阅读及其活动过程,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度。每一则传闻的流行,都可以看作是世人对《红楼梦》感兴趣的意念发端。每一则传闻的言说叙事,可以看作是对《红楼梦》阅读意义的新构建。每一种传闻的重提与变异讨论,亦可当作是世人对《红楼梦》知识特征的新构建^[17]。每一则传闻都是传闻者关于《红楼梦》的独一无二的阅读活动,是传闻者故意造疑标异的氛围渲染。从这个角度讲,世人对《红楼梦》“宫闱秘事”“明珠家事”的有意传闻,让谈论《红楼梦》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社会话题。传闻能够激发世人阅读《红楼梦》的兴趣,扩大此书的传播范围,推动此书走向大众视野。在这种有意为之的叙事情境中,传闻让《红楼梦》的后世阅读具有公开化的舆论支持,形成了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阅读效应。这里的阅读效应存在着持续散播《红楼梦》谣言式舆论的极端化可能,乃至可能带来扑朔迷离、真真假假的信息误导。相关误导的最主要特征是:在传闻话语形态中,传闻叙事逐渐异化成对《红楼梦》的各种有意误读,变成能够引起世俗注意的重要舆论事件。例如,江苏山阳人黄钧宰(1826—1876?)《金壶浪墨》卷八“为山”条曾载:“腊月朔,行抵江宁,寓居城南正觉寺十有八日。寺有水月庵,无澜舍,忍忍居,窈曲而轩洁。释子为山,能诗善棋,予每出饮,入夜醉归,煮茗清谈,深慰寥寂。一夕,戏语为山云:‘无酒学佛,有酒成仙,比和尚恰高一着。’为山应声云:‘出门笑花,入门见月,看先生且到三更。’为山书室,套板《红楼梦》极精,予意其必将掩藏,而举止殊无愧色。雪琴(芹)作此,原与天下能作和尚者读,不与凡夫俗子读也。能读《红楼》,乃是真和尚;读《红楼》而见人能不掩藏,乃是绝好和尚。”^[18]这则记载提供了《红楼梦》的另类阅读者——和尚,也提供了寺庙的特殊阅读场所,更表述了传闻可能引发争议的舆论“噱头”。因为“雪琴(芹)作此,原与天下能作和尚者读,不与凡夫俗子读”的议论,带来了何为《红楼梦》代表性阅读群体及其如何被阅读的话题延展。此意也重探了《红楼梦》与世俗之人日常生活如何关联的多重可能。可以说,每则传闻的新信息披露,隐含着传闻者盲信盲传的品评热情。

进一步而言,“流言蜚语”“捕风捉影”乃至“捏造诋毁”的热点式传闻,有效推动了《红楼梦》的经典构造。传闻让《红楼梦》的社会价值得到了积极或消极的全盘审视,促使《红楼梦》在传闻的流播中隐含着突破时序限制的恒常关注度。清中叶以降的世俗社会对《红楼梦》有闻必录的记载,即是塑造《红楼梦》社会热点的有意之举。这就构成了《红楼梦》在传闻话语中被反复炒作的重要文本形态。因为每一则传闻批判都会带来《红楼梦》社会价值的新讨论,推进《红楼梦》社会舆论的动态流变^[19]。尤其是,连《红楼梦》传闻者都感觉到相当部分的传闻只是“想当然”的虚造时,世人将进入对传闻展开反思性阅读的阶段。当针对传闻的反思性阅读及其具体行动只能带来“出示严禁,而力量不能远及,徒唤奈何”的收效时,这就表明传闻的社会效应已深入到读者个体的阅读体验中。此类体验易于形成针对《红楼梦》传闻而非小说文本的阅读热情。这时候,传闻就成为传闻者、《红楼梦》文本和其他读者三方面的一种沟通载体。虽然传闻即便是对《红楼梦》文本意义起不了决定性作用,但也至少带来了《红楼梦》被关注和谈论的另一种理解视角。只有当《红楼梦》各种传闻具有相当量的读者市场,才会在一定的社会舆论情景中被不断生产与解构。或者说,我们紧紧抓住传闻者所言“无情者不可妄读书,亦不可妄作书”等追求,揭示各类传闻在传闻者精神世界中的存在意义,分析各类传闻如何达成传闻者“与我有同心”的情感诉求,凡此种种皆能直面传闻者的实际阅读行动。可见,传闻是《红楼梦》接受渠道中一种特殊的文本形态。传闻的文本形态会对《红楼梦》的受容史,带来

解读策略或表达凭借等方面的影响。传闻者对各类传闻的理解、援引及评判等预期，依然会导致传闻舆论视阈下《红楼梦》阅读规则的不自觉建构，带来形形色色的传闻方式及信息各异的载录。我们将传闻者当作《红楼梦》的重要读者类型，将传闻的援引、吸纳及评判当作此类读者常见的阅读行为。这种思路能够揭示《红楼梦》被世人观察、阅读及讨论的多样视角，抽绎出《红楼梦》在世俗社会中的形象和价值，借此分析传闻者对《红楼梦》经典意义及予以“现代转化”^[20]时的另类构造过程。要之，《红楼梦》传闻的大众化流播与不断新造传闻的情况，不仅可以看作是《红楼梦》历代动态诠释的一部分，而且亦推动了《红楼梦》经典生命力的延续性。

当然，清中叶以降关于《红楼梦》传闻的阅读构造现象一直延续至当下，不断催生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与内容情况的真伪之争。现代传闻者对《红楼梦》的版本或曹雪芹的真实指向产生了某些非学术的恶意造假，由此产生“探佚学”“高鹗伪造”等新构造的传闻。这在导致现代传闻者不断重审曹雪芹的创作心理或《红楼梦》时代背景的同时，逐渐偏离了对文本内容的研究。尤其是，当下对《红楼梦》作者问题、情节“探佚”的持续化污名或流量式娱乐，进一步导致当下碎片化误读的泛滥，阻碍了对《红楼梦》的客观研究。从读者选择、时代文化与传闻构造的交杂动态看，当下社会对《红楼梦》经典性的期待、焦虑及重构欲望已达到十分强烈的程度。这些促使当下的传闻新造对《红楼梦》的学术风气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当下的《红楼梦》研究需要规避过度索隐、猎奇式解读的传闻新造及有意误读等行为，避免对《红楼梦》经典内核的消解。

四、结语

据前文论述可知，读者的传闻构造对《红楼梦》流播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是，传闻构造对《红楼梦》社会形象与接受导向具有一定程度的“污名化”倾向；二是，作为一种阅读方式的传闻，确实制造了《红楼梦》批评话题的多重性，也扩大了《红楼梦》的世俗关注度。不论是“流言蜚语”式的传闻构造，还是以讹传讹式传闻阅读，皆是各个时期不同类型的读者对《红楼梦》多元意义的阐发行为。相关阐发不仅扩大了《红楼梦》的流播渠道，亦带来了《红楼梦》阅读选择的多元化。可以说，历代读者对《红楼梦》的传闻构造与传闻阅读，已成为《红楼梦》阅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情况可视为《红楼梦》在各种“流言蜚语”接受环境中的经典化构造。我们对《红楼梦》传闻的构造与传播的多角度研究，有助于把握《红楼梦》浸入世人阅读生活的若干典型细节。推而言之，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在流播过程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传闻记载与再造。像写作《水浒传》的罗贯中被传“子孙三代皆哑”^[21]，《金瓶梅》被传“缘起王凤洲报父仇”^[22]等，已然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力。这些小说传闻的社会影响虽然不如《红楼梦》来得广泛，其间传闻话题的再造频率或传闻流播速度亦不如《红楼梦》；但我们亦可从社会舆论构造的角度，去分析它们在相关小说阅读史上的文化意义。我们不能仅仅将小说传闻当作一种乌有之说，摒弃不理。因为传闻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体现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在诠释与误读的张力中被不同时期的读者反复品评的一种流通状况。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中国古典通俗小说在不同文化场域中被加以思想对话或经典构造的缩影。

参考文献：

- [1] 潘德舆. 潘德舆全集·第3册[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 [2] 罗先海，袁旻. “阅读”梁启超：少年胡适文学观的初步养成[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8(5)：101-107.
- [3] 朱一玄. 红楼梦资料汇编[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 [4] 周绍良. 周绍良论红楼梦[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290.

- [5] 俞平伯. 红楼梦辨·下卷[M]. 上海: 亚东图书馆, 1923: 39.
- [6] 顾宇, 温庆新. “污名化”与《红楼梦》社会身份的变动及传播趋向[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3(6): 41-48.
- [7] 随园诗话[M]//袁枚. 袁枚全集新编·第5集. 王英志, 校点.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8: 912.
- [8] 李慈铭. 越缦堂读书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926.
- [9] 赵之谦. 章安杂说[M].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9.
- [10] 羊城新闻[N]. 申报(上海版), 1872-06-03(4).
- [11] 阙名. 谭瀛室笔记[M]//一粟. 红楼梦资料汇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413-414.
- [12] 阿检. 饮水诗词集跋[M]//饮水诗词集·卷末. 万松山房 1925 年刊本.
- [13] 唯我. 饮水诗词集跋[M]//饮水诗词集·卷末. 万松山房 1925 年刊本.
- [14] 玉诺. 林黛玉与冯小青: 《墙角消夏琐记》之十三: 十六[J]. 明天, 1929, 2(9): 24.
- [15] 蒋瑞藻. 小说考证[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556.
- [16] 邓之诚. 骨董琐记全编[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6: 193.
- [17] 温庆新. 《梦痴说梦》对《红楼梦》的“证道”解读: 兼及对通俗小说阅读史研究的意义[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8(2): 191-198.
- [18] 黄钧宰. 黄钧宰集[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200.
- [19] 温庆新.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 现代“《红楼梦》化”的生产性批评接受[J]. 中国文学研究, 2021(2): 155-162.
- [20] 温庆新. “他律”建构与传统目录学小说批评的现代转化[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14(2): 136-146.
- [21] 王圻. 续文献通考[M]. 北京: 现代出版社, 1986: 2698.
- [22] 朱一玄. 金瓶梅资料汇编[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2: 85.

As a form of public opinion constru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rsay and the “gossip-style” reading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WEN Qingx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China)

Abstract: Throughout history, readers have constructed various hearsays about the author, creation, skills, and disseminat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is type of hearsay adopts a narrative pattern of first quoting and then evaluating,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gathering various information from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orming a mixed form of rational and irrational gossip-style social public opinion. This reflects taste, attitude, and habits of rumor mongers when readi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expands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n various narrative recollections of the rumor mongers, showcasing the diverse possibilities of the rumor mongers' reading imag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ding history research, hearsay as a form of reading construction increased the possibility of discussion among various groups of people at that time. This kind of research can not only restore the typical details of the observation and reading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but also extract the image and value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n secular society. In short, this move has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examining the widespread phenomenon of rumor construction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opular novels.

Key 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hearsay; public opinion construction; reading history

[编辑: 陈一奔]